

(本丛书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提供翻译及审核资助)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

陈方正 主编

惶惑的旅程

Raymond Carr. Modern Spain 1875-198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责任编辑--桑 木

封面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刷--上海市印刷六厂

本--850X1168 1/32

张--9.25

字 数--21.3万

次--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数--3,000

号--ISBN 7-80616-164-3/K·10

定 价--16.00元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总序

以西方眼光衡量，中国人常被认为过份倚赖与尊重群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却又十分自足，即使受到外界极大刺激或面对种种炫惑，也往往无动于中。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发展趋向来观察，这种看法似乎是不无道理的。在上一个世纪，讲求西学的前驱如魏源、王韬、郑观应等犹如空谷足音，响应乏人，固不待言。在本世纪西潮澎湃，德先生和赛先生被供奉起来，新思想靡然成风之后，纯学术的主流（这里所指，以人文学科为限）虽然视野扩大了，在方法上革新了，可是，就方向和领域而言，即始终没有大变。固执如辜鸿铭，或者在神州遭逢钜劫奇变之际甘愿身殉的王国维固然不待言，就是继起的陈寅恪、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郭沫若、冯友兰诸大家，乃至近数十年的许多博学鸿儒，无论才识如何卓越，见解如何不群，学养如何渊通，其为学用功的着力点却绝少有能翻出中土的经史、制度、词章、思想范畴以外。这和欧美、日本许多学者如饥似渴地终生钻研异域文物、典章，思想，乐而忘返，恰好形成强烈对比。

这一现象已经存在大半个世纪了，它恐怕并非由个人或者偶然性因素使然，而是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密切关系的。

这传统观念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切说明。它可能是一种强烈

的“返本归源”意识，可能是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潜存厌恶和恐惧，亦可能是历时已一个世纪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仍然在作祟。无论其底蕴如何，其结果则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始终保持近乎浑然一体的状态。西方有汉学、藏学、埃及学、非洲学，日本也曾经有兰学、阳明学、国学并存。至于中国，在大学里虽然也教授西洋史、西洋文学、哲学以及外语等科目，却似乎从没有希腊学、罗马学或越南学、日本学可言，甚至连有十分切身关系的（譬如说）英国历史或俄罗斯文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也并没有能占一席位，也不能成“学”（马列思想和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自是例外，但那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其所以曾如此，也许是由于欧洲和日本自古以来就习惯于不同文明同时并立，各自保存本来面目，而中国则从来只意识到其本身庞大和融合型的文明之存在吧。

无论其原因何在，中国人文学术传统之重“本”轻“末”，重中土而轻四裔外洋，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深根广被，屹立数千载，自然有莫大关系。然而，不能否认，这对于当代中国，又是一个严重问题。图道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分析西班牙如何以三百勇士征服墨西哥数千万众之后说：“这惊人的成功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也就是这一能力，使得“西欧三百五十年来同化别人，消除外在界别的企图，基本上得以成功。”也许，在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也是国人把心思从自我(the self)稍稍转移到别人(the other)身上，把目光从中土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时候了。

这套小小的丛书名为“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目的在于通过世界近代史译著，介绍自十七世纪以来受到西欧势力扩张影响的其他古老帝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促成欧洲本身蜕变的一

些深层因素。这两方面，我们认为，都是值得国人注意，而至今大部分还是被忽略的。这里所谓古老帝国，主要是指欧陆东北边缘的俄罗斯帝国，东南边缘的奥托曼帝国，西南端的西班牙帝国（它虽曾占欧洲权力结构的核心地位，但由于思想和制度停滞，到十八世纪中叶已被排斥于主流之外），以及远东的日本帝国。它们的共同点是各自有悠久的传统与文化，和经过长期发展的政治结构与军事力量，因此具有抵受西欧冲击的相当能力，能够通过一系列反应与蜕变达到某种能够立足于现代世界，甚至与西方作一定程度竞争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有一段和中国类似的艰困而漫长的现代化历程。这些历程的考察可以带领我们脱离华夏中心的世界观，令我们以更客观和实际的心态来了解、比较西方与世界其他文化、政治体系的互动。

至于欧洲本身的现代化蜕变，从发轫至今已经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基本动力是国人长期探索的问题，但答案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从服膺于坚船利炮，到科学、民主和各种政治思想的提倡，乃至今日的经济改革，无疑代表中国对现代社会认识的逐步深入与提高。但这些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呢？也许，在更深的层次，我们会发现，现代化并非单纯由一个或者几个固定因素造成，而是由许多在不同阶段各有重要作用的因素相互促进而推动的。麦尼尔在《竞逐富强》一书中对西方军事力量进步的研究便有这样的结果：军器的进步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科学发展四者有错综不可分割、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这正如生物演化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关乎某一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细致而又深刻的研究，是我们亟需注意和了解的。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朝这方向踏出了一小步。

当然，翻译只是学术工作的起点，它离开原创性研究和建立学术传统还十分遥远。但我们热切希望，它的构想和所提供的比

较性视野能引起国人注意,能带来一个虽然微小,但仍然是新的开端。

编纂这套丛书的念头,始于1988年秋季,当时原意只不过是为一个香港中文大学课程提供中文参考资料。这一计划自构思迄今,不知不觉已有七八年功夫,其间曾先后得到孔慧怡博士、李弘祺教授、青峰女士以及姚楠先生等的多方协助,但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编辑力量不足,所以书籍的出版一直拖延,迟迟未能实现。倘若不是刘小枫博士从1993年开始慨然大力帮忙,代为联络出版者并筹划校订事宜,而刘锋先生又大力协助校订的话,这套书的面世恐怕还将会是遥遥无期的。在此,我谨对以上各位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陈方正

1996年3月

序

现代化从西欧开始,但欧洲并非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许多不同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之中最特殊的,也许要算是西班牙了。在十六世纪,无论从政治、军事、海外殖民的角度看,它都是欧洲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到十八世纪,这个现代化的先驱却已经没落,成为欧洲边陲一个没有活力,不受尊敬,甚至不受注意的二流国家。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当革命和自由思想终于传到西班牙,并且产生政治影响的时候,它好像应该能赶上中欧的“迟现代化国家”——意大利和德国了。意想不到的,那只不过是它在政治旷野中长达整个世纪的飘泊之开始。这我们称之为“惶惑的旅程”,也是雷蒙德·卡尔这本现代西班牙史的主题。

要了解现代西班牙,必须稍为回顾它前四百年的历史,因为困扰这个国家的,正是历史和传统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历史上,塑造西班牙性格,激发它辉煌成就,同时也决定它凄凉没落的,是三个相关主题:宗教、民族和征服。1469年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加斯底和亚拉岡缔姻,揭开了近代西班牙的序幕。在随后半个世纪(1469—1516)间,伊莎贝拉和法迪南这两位年轻有为、信仰虔诚的“公教君主”携手成就了

三件大业：统一半岛上林立的基督王国；攻下南方的格拉纳达，也就是盘据在半岛上已达七百年之久的回教徒最后一个据点；资助哥伦布西航，并在他发现的新大陆开拓殖民地。随后，在雄才大略的查理士五世(1516—1556)治下，庞大的美洲殖民帝国建立起来，数以吨计的黄金和白银源源不绝地从新世界流入半岛；对于西班牙，美洲还并存有大量来自欧洲的统治者以及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士在位四十年的梦想就是克服各种(特别是法国的)阻力，一统基督教世界。继承他的是腓力二世(1556—1598)，一个谨慎、勤奋而具有炽热宗教信仰的人：父亲要建立大帝国，他则致力于维持教会正统和信仰纯洁。不幸，和时代背道而驰的这两项大计都彻底失败了：查理士没有打败法国，腓力二世也不能征服信奉新教的荷兰，更不要说已建成强大海军的英国。父子二人数不清的战争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只是使国库虚竭，社会贫困离心而已。

到十七世纪，欧洲迅速走向俗世化、资本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政治，西班牙则仍然停留在中古形态：一个只知追求宗教正统和大帝国梦想的僵化指令性政治结构，沉重地积压在许多具有不同语言、风俗和法制特权的民族之上；商业、民生、科学、新思想都为一个世纪之前的宗教理想和征服者形象所窒息，都不能发芽、生长。正如著名西班牙史学家维仙韦夫(Jaime vicens vives)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斯底不了解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无法与欧洲竞争。这就是今日西班牙历史中心问题的关键。”

处于紧贴欧洲心脏的位置，而又不了解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它所带来的变化与力量，是十分危险，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腓力三世(1598—1621)和四世(1621—1665)这两位继位君主没

有意识到这危险，只是盲目地背著历史枷锁挣扎，企图恢复上一世纪的光荣。结果到十七世纪末叶，帝国的欧洲属土就轻易为列强所瓜分，西班牙皇位本身也为法国波旁族系(House of Bourbon)所夺去。虽然它的海外殖民地要到十九世纪才相继丧失，但叱咤风云的西班牙帝国则随著十七世纪终结了。在其后一个半世纪，波旁皇朝把理性改革和欧洲思想引进西班牙的努力并不成功；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入侵、自由思想的传播和多次民众起义对政局造成了冲击，但也都没有产生任何深远、持久的影响。

所以，当进步党人获得军方支持，在1868年发动不流血政变和革命，为民主宪政揭开序幕的时候，西班牙在思想、社会或政治等各方面，都是极度混乱、分散、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的。这种混乱反映于它五花八门、令人迷惑的许多政党和政治团体。例如属于左派的，有社会党、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属于右派的，有保守党、长枪党、军队势力、皇党和种种天主教组织；中间派则有进步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偏激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它们全部加起来，总数恐怕有二、三十个之多。这样，在随后漫长的百余年间(1868—1975)，西班牙经历了两度共和、两度内战、长时期腐败、不稳定的君主立宪和两度军人独裁，自然是不足为奇的。

在十七世纪，西班牙的崩溃是由十六世纪传统与新时代的相背造成，那么它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惶惑旅程又如何解释呢？它并非缺乏接受新思潮感染的机会——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思想都从只隔著比利牛斯山的法国和只有数百哩水程的英国迅速传入，而且生根发芽；它也绝非激进、抛弃传统——教会势力始终根深蒂固，而除了军人独裁和其

他短暂时期之外，波旁皇室稳如磐石；它更没有摧毁民间社会：地方民族主义不但强大，而且直接影响全国政治。

也许，答案在于西班牙的保守力量太强太牢固，所以无论从天主教会内部，抑或从社会其他部分，都不能产生与传统决裂的力量，从而形成政治突破。这一点，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像宗教审判所这么一个制度，要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初次正式受到挑战，而教会还坚决反对废除。第二，要到1898年美、西战争的时候，因为一下子丧失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等三处海外殖民地，西班牙才初次感到全国性的危机与震撼。然而，由此激发出来的所谓复兴运动(regenerationism)，在极大程度上仍然只不过是一系列缺乏思想内涵的政治口号，对国民意识并没有真正冲击。在这个时期西班牙最出色、最有深度的文学家，最能捕捉民族灵魂的思想家要算是乌那穆努(Miguel de Unamuno)了。但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本名著却是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理性的嘲讽，对罗耀拉、特伦特会议、救赎和永生(他称之为“超越经济学”)的颂扬，和对现代的愤怒与蔑视：“我们没有科学精神？那又怎样？我们有其他精神……让其他人去发明好了……我们有自己的工作。”鲁迅剖析狂人心理，创造阿Q典型，为的是对“吾国与吾民”作无情鞭挞；乌那穆努则恰恰相反：他倔强地说：“吉河德先生正是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因而不朽”，藉以表明西班牙在失败中的不屈气概。

是的，在走向现代之前，英国有它的议会造反和清教徒革命；日本有它的雄藩内部政变以及幕藩战争；荷兰、美国都经过独立战争洗礼；至于法国、俄国所经历的思想剧变和大革命，以及土耳其在凯末尔时代所经历的猛烈政治、宗教和思想革命就

更不必说了。这和中国之必须经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在和传统决裂之后，才能向新时代、新体制迈出第一步。而对西班牙来说，也许是由于与回教徒七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以及十六世纪帝国成就之辉煌在民族心理上所产生的偏执，正统天主教意识无论在政治抑或思想上都变为牢不可破，因而这一关键性决裂姗姗来迟。它的初次出现，恐怕要算是1936—1939年那一场震惊全世界的酷烈内战了。没有三十年代这一趟愤怒、拼命的血与火之洗礼，这一场对全体西班牙人存在承担(existential commitment)的考验，那末在七十年代中期佛朗哥漫长的专政结束之后，稳定的民主立宪政体是否能那么自然、顺利地出现，而且为绝大多数人接受、拥护，恐怕还是有疑问的。

陈方正

1996年4月

原 序

本书收入了笔者在过去二十年内发表的部分著作。西班牙编史工作的复兴,以及境外学者对西班牙现代史重新产生的兴趣,使我的这些旧著得到充实,有些地方并作了订正。

从本书各章的详略可以看出,笔者所征引的主要是西班牙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近年的著作。由于有关晚近几个时期——尤其是第二共和国时期和内战时期——的西班牙论著已广为英国同行所征引,英国读者对这些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因此笔者仅对 1875 年至 1979 年的一段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本书集中论述的,是可能被人们视为正统的政治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否认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西班牙这一时期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寻求途径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因为,只有长期为广大公众认可的政府才能保持稳定,依仗武力的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统治方式都未能赢得“中立群众”的效忠,消除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这些统治方式恰恰是靠着群众的漠不关心态度才得以维持。1931 年第二共和国突然进行的政治动员,使原来因政治制度而被掩盖的种种冲突表面化,陷入了失控状态。于是,西班牙又走上回头路,经历了为时 40 年之久的“严酷的外科手术”。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班牙,不像第二共和时期的西班牙那样充满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个新的民主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是以往任何政权都未曾有过的。现在,这个国家与相邻的民主国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通货膨胀、失业、资金短缺、对政治漠不关心、恐怖活动。同往常一样,使政治生活复杂化的那些地区问题在西班牙比在别处更为严重,而这些问题是最最难以冲破的障碍。

雷蒙德·卡尔

1979 年 12 月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目 录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总序·····	1
序····· 陈方正	1
原序·····	1
第 一 章 1868—1875 年 革命与复辟—— 自由的传统·····	1
第 二 章 1875—1914 年的经济:停滞与 进步·····	21
第 三 章 1875—1914 年 过渡中的社会·····	40
第 四 章 革新运动与社会制度批评者·····	61
第 五 章 1898—1917 年的政治:自上而下 革命的失败·····	95
第 六 章 1917—1923 年 议会君主制的 危机·····	107
第 七 章 1923—1931 年 里韦拉的独裁 政权与君主制的崩溃·····	128
第 八 章 1931—1936 年 第二共和国·····	152
第 九 章 1936—1939 年 内战·····	174
第 十 章 1939—1975 年 佛朗哥主义·····	199

第十一章	胡安·卡洛斯的君主制:向民主 的过渡.....	222
附录一	西班牙政治大事年表 1868—1979	233
附录二	译名对照.....	241
附录三	索引.....	245

第一章

1868—1875 年 革命与复辟——自由的传统

第一节

“自由”这个名词，作为一种政治词汇，在西班牙，最初是用¹于描述 1808 年法国入侵后在加迪斯避难的一批激进爱国者。1812 年，他们起草了一部宪法，以民权至上的革命学说动摇了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基础；这部宪法后来被从圣彼得堡至那不勒斯的激进民主人士奉为圭臬。1890 年，当选举权在英国仍受到限制时，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制度已在西班牙确立。

对于现代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一般的解释是，以“先进”的自由主义制度强加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保守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当普选权实行时，至少有 85% 的人口靠土地为生。在巴斯克诸省的小自耕农中拥有雄厚势力的卡洛斯党，曾两次企图通过内战摧毁自由主义及其所做的一切工作，以恢复“传统”的天主教社会。自由阵营中（由抵制卡洛斯党神权政治的人们组成）的保守派称“温和党”（Moderados）得到军队和国王的宠幸，在 19 世纪中叶几度执掌政权；他们抵制以民权至

上为基础的政体,并成功地曲解自由主义制度,使之成为狭隘的寡头政治的工具,这种寡头政治以乡村有产者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为基础。但这种倒退不时为自由主义的革命所打断。这些革命——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非社会变革——由两种因素构成:“军官政变”(pronunciainiento),即军官发动的反叛,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由有名望的中产阶级进步党人、中下阶层人士和劳工阶级中的民主人士所发动的城市起义。这种革命联盟是不稳定的,不久便解体了。将军们不信任平民的合作,而中产阶级的革命者则与其激进民主派的同盟者争吵闹翻。

这些革命中,最后一次 1868 年的“光荣革命”——19 世纪各次革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响了 1875 至 1923 年的整个西班牙历史。它采取的就是典型军官政变形式。

- 2 西班牙军人干政,为何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呢?在某种意义上,答案很简单。在一些社会民主力量还比较软弱的国家——例如第三世界那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军队是举足轻重的,严格的军纪团队精神,更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抗衡。

然而,在西班牙,在培育出一批政治将领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仍然是政治结构:政治家们为寻求支援而去结纳将军们。1833 至 1868 年在位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她拥有的权力足以同英王乔治三世相匹配。因为国君有全权任命内阁,并赋予内阁颁布法令、解散议会的重要权力,这就使内政部长可“炮制”议会多数。伊莎贝拉在晚年宠幸保守的、持强硬路线的温和党,撤销了进步党人的官职,从而使他们与颁布法令、解散议会的重要权力绝缘。进步党一旦丧失了自己担任内务部长时所拥有的势力,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赢得选举,只能转向军队,在将领中寻求同情者,以便通过军官政变重登政治舞台。于是,军事政变就取代选举而成为一种实现政治变革的手段。

1868年9月的政治—军事革命，把伊莎贝拉二世赶到法国，去接受拿破仑三世的款待。这场革命是“遭到排斥”的进步党人和比较保守的自由联邦党的杰作。进步党人的“刀把子”是普里姆将军，一个药剂师的儿子。自由联邦党由塞拉诺将军领导，他一度是伊莎贝拉的宠臣，但当时已遭女王排斥，被撤去官职。这个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有“九月联盟”之称。这个联盟希望以英国或比利时为榜样，建立一个自由的君主立宪政体。

然而，这一目标未能达到。进步党人与其在城市中的民主盟友发生了争执。他们在拥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他们推选霍亨索伦王室^①的人为候选者的企图点燃了普法战争的火花；而当他们终于物色到萨沃伊的阿马德奥为国王时，他们之间的争吵又使国王不得不逊位。1873年，西班牙别无选择而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而且是联邦共和国。这时，在卡塔赫纳这样的南方大城市中，主张州郡行政制的人们爆发了多次叛乱，激进的民主人士接管了政府。西班牙的统一似乎面临危机。西班牙的传统体制也是如此。教堂被焚毁。在阿尔科伊，发生了一次工人起义，据信与第一国际的影响有关。军队纪律荡然无存，士兵扯去军官的肩章，踩在脚下。1874年1月，帕维亚将军率领军队开进议会(Cortes)，于是联邦共和党人统治（如果可用“统治”这个字眼）的共和国就由塞拉诺将军领导下的保守和单一的共和国取代。

塞拉诺面临卡洛斯党在北方发动的战争和保守分子普遍的不满——在军队和马德里的贵族中尤其如此，他们拒绝出席塞拉诺夫人的招待会——他仿效麦克马洪的保守的法兰西共和国而建立的国家似乎并不稳固，仅是昙花一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① 普鲁士的王室(1701—1918)。——译者